

# 城镇化，中国经济接力棒

## China's Awesome Urbanization

文 田国强



好的城镇化应是通过市场机制，用价格信号吸引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自由流动、组合过程中基于追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动因，完成高效率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

**当**前，受诸多短周期和中长期因素重叠的共同作用，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正面临趋势性下滑，亟待找到新的内生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引擎，城镇化被各界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那么，如何检测城镇化的质量呢？中央提出了三条标准和要求：一是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布局的合理度；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度；三是城镇化全过程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的融入度。这三条实际也揭示了新型城镇化与以往城镇化的关键区别，惟其如此，新型城镇化才能接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接力棒。

其一，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要让位于市场导向型的城镇化。好的城镇化应是通过市场机制，用价格信号吸引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自由流动、组合过程中基于追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动因，完成高效率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目前，相对于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言，土地市场受到僵硬的土地制度束缚，已成为扭曲最大、发育最畸形的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将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

其二，自我现代化的城镇化要让位于包容性发展的城镇化。2011年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虽已达51.3%，首次突破50%关口，然而这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1.6亿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他们的市民化面临重重障碍。这种“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如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将会产生非常显著的经济增长绩

效。考虑未来十年还有2亿以上的新增城镇人口，如按较低口径，以市民化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意味着能够带来36万亿以上的投资需求。

上述“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税制度等与新型城镇化不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它们严重阻滞了农民的市民化转型，并造成了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周期性出现的庞大的“民工返乡潮”和“民工荒”。因此，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

其三，粗放式发展的城镇化要让位于精益式发展的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在今年的十八大会议中即已被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高度，并被要求贯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此次中央经济工作对未来城镇化要在全过程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创新提法。这些概念不应是虚设的，要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家庭相挂钩，建立实实在在的激励约束机制，将传统城镇化道路下的简单的“铁公基”建设乃至居民生产生活方式，朝着更为高效、更为智慧、更为环保的方向牵引，为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搭好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有望成为拉动新兴产业需求、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